

doi:10.19920/j.cnki.jmsc.2021.08.017

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①

赵耀辉¹, 杨翠红^{2,3}, 李善同⁴, 左学金⁵, 钟甫宁⁶, 方新⁷, 王丰^{8,9}, 张俊森¹⁰,
李树茁¹¹, 刘善仕¹², 李海峥¹³, 方汉明^{14,15}, 张维¹⁶, 李磊^{16*}, 张琴^{16*}

(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 100871; 2.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190;
3.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190; 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北京 100010; 5.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海 200025; 6.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32;
7.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49; 8.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 200433;
9.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 尔湾 CA 92697, 美国; 10.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杭州 310058; 11. 西安交通
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西安 710049; 12.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广州 510641; 13.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1; 14.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 费城 PA 19104, 美国;
15. 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1210; 16.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天津 300072)

摘要: 人口结构对于国家战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结构变化深刻影响着经济增长模式、消费模式和中长期竞争力发展. 揭示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演化机理, 研究其对全社会公共治理、商业模式等微观组织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变化规律等,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 现阶段研究已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改善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人口跨区域流动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果. 未来研究中, 应继续关注人口结构的影响因素和演化机理、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人口结构变迁下的公共治理政策研究, 微观组织管理理论创新等问题.

关键词: 人口结构; 社会经济发展; 人口老龄化; 公共治理; 国家战略

中图分类号: C9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07(2021)08-0154-09

0 基本概念、科学意义与国家战略需求

人口结构是指人口在自然属性(如年龄、性别)、知识技能(如教育水平)、社会属性(如城乡身份)、空间分布(地域)等方面的比例关系. 人口结构变化有其自身发展规律, 并且能够对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理解人口结构本身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规律, 理解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可

能产生的影响, 对于改善人口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建国七十年来, 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建国初期的 1950 年, 我国人口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形状, 中位数年龄不到 25 岁,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为 7.4%, 5 岁以下人口占比为 13.8%, 人口预期寿命只有 43.8 岁^[1]. 到 2019 年, 我国早已成为一个老龄化的国家, 中位数年龄上升为 38 岁左右,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为 18.1%, 5 岁以

① 收稿日期: 2021-03-15; 修订日期: 2021-07-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专项项目(71940001; 71940007; 71988101).

通讯作者: 李磊(1980—), 男, 山东青岛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mail: lilei@tju.edu.cn; 张琴(1977—), 女, 河北定州人, 博士, 副教授. Email: tjzhangqin@tju.edu.cn

下人口占比为6.0%,人口预期寿命达到77.3岁^②。建国初期,我国居民教育和城镇化水平低下,80%的人口是文盲,90%的人口聚集在农村。根据2015年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当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32%的人口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完成高中的比例为28.2%,完成大学的占10.7%^③。城乡人口分布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2019年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已经降低到了40.4%^④。

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巨大转型,我国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首先,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建国初期1950年~1955年的6.11降至2015年~2020年的1.69^[1],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处于较低水平。按照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中方案”的预测,到2100年,全中国的人口将减至10亿人;若按照“低方案”的预测,届时中国人口将减至6亿人^[1],仅为现今人口总量的一半。在生育率快速下降与寿命延长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远快于发达国家:2019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12.6%,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26.1%,高于许多发达国家^[1]。我国传统上依靠家庭养老,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将给家庭养老构成巨大的挑战,并且可能通过增大养老金体系的负担,造成支付困难,扩大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构成威胁。除此以外,在人口政策和重男轻女传统的共同作用下,过去几十年我国出现了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调,由此带来的男性失婚现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成为我国一大困扰,值得认真应对。

在教育领域,虽然我国居民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青壮年存量人口没有初中学历,每年大量的初中生无法升入高中,形成新的低教育群体。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文化水平低意味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永远属于低技能劳动力,并且无法在技术进步的同时获取

新的技能。技能的差距将转换为收入的差距,这些低技能劳动力在未来激烈的职场竞争中将永远处于劣势,长期占据收入分配的底端,并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人口地区分布方面,尽管中国已经放开了劳动力流动,城镇化进程加快,但是户口制度仍然对人口流动带来了制约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流动人口仍然不能与当地户口居民享受同等的权利。在很多地方,没有本地户口的居民仍然在就业方面面临歧视。社会保险(医疗、养老保险)属地化管理,也提高了人口流动的成本。这些限制人口流动的障碍,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夫妻分居现象,严重影响了家庭的稳定性,妨碍了家庭在育儿、养老方面发挥正常的作用,对未来社会稳定发展构成隐患。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非常值得担忧,需要社会关注。Chen和Fang的研究发现我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推广的“晚、稀、少”政策使得当时处于生育年龄的妇女的生育率大幅下降,但是当这些少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以后,他们的心理健康也受到负面影响^[2]。Fang等的研究发现春节期间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显著下降,也间接说明了缺少家人陪伴是老人心理不健康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⑤。

由此可见,人口结构虽然看似只是涉及个体的生育、教育、迁移决策,但是汇集起来的力量足以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人口结构对于我国社会经济治理意义重大。需要认识这些影响的规模、渠道,同时理解人口结构的发展变化规律。通过这些研究,一方面可以制定应对措施,力求化解或者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另外一方面,在理解人口结构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其发展的方向进行合理引导。

② 《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nhc.gov.cn/guihuaxxs/s10748/202006/ebfe31f24cc145b198dd730603ec4442.shtml>, 2020年9月19日查看。

③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人口与受教育程度数据加总计算得到。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⑤ Fang H, Lei Z, Lin L, et al. Family companionship and elderly suicide: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J]. NBER Working Papers, 2021.

1 国际发展态势与我国发展优势

1.1 年龄结构和人口老龄化

我国所面临的人口结构变化,在发达国家已经早已发生.主要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很早就下降到更低水平之下,伴随着寿命的不断延长,在上个世纪已经陆续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为了稳定人口规模,同时缓解老龄化问题,很多国家把提高生育率水平当作重要的公共政策,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生育的举措,如奖励生育、税收优惠、慷慨的育儿假、提供免费婴幼儿照料服务等。

我国自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就开始鼓励少生少育,1971 年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在 1980 年之后政策变得更加严格和缺乏弹性.严厉的限制生育的结果,使得我国提前进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进而提前遭遇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了性别比例严重失衡、青年占比下降等诸多人口结构问题.为了促进我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2015 年 10 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从 2016 年起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效果低于预期,最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不断创造新低,引起各界忧虑,把生育政策从限制改为鼓励的呼声越来越高。

理解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生育行为,首先要认识到生育行为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自加里·贝克尔将家庭问题引入经济学分析范畴以来^[3],经济学界对此展开的大量研究,其中不乏对中国的研究.Zhang 通过研究微观生育数据,发现教育和社会经济状况对生育率有重要影响^[4].他与合作者的研究还表明,尽管生育限制政策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会带来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5].很多经济学者研究了严格的生育政策带来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以及人们规避生育政策的行为^[6].Zhang 系统地分析了一胎政策对系列家庭结果的影响^[7].

根据经济学理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有生育、养育子女的成本,但是最主要的是为生育、养育子女付出的机会成本,这些成本最主要是由女性承担,体现在因为生孩子而离开工作岗位,并且在养育过程中由于承担主要照料责任而放弃

的工作、培训和晋升机会,导致收入下降.这些代价,又名“生育惩罚”,可能是终生的.目前,国际上有很多测算生育惩罚的研究,但是中国尚未有严谨的研究出现。

我国自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大规模改制以来,计划经济时代用人单位为了解决职工托幼问题而建设的托儿所就解散了,改为由社会提供.长期以来,虽然招收 3 岁以上儿童的幼儿园已经非常普及,但是 0 岁~2 岁的缺口一直没有补上,导致育儿成本居高不下.2020 年 5 月 9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三方面举措:一是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全面落实产假政策,支持脱产照护婴幼儿的父母重返工作岗位,为家长及婴幼儿照护者提供婴幼儿早期发展指导服务.二是加大对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三是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跟踪这项政策的实施进度,以及对于我国家庭育儿成本和生育决策的影响,将有重要意义。

提高生育率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的压力,但是其作用有限.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利用好现有资源.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是理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生影响的机制,在此方面已有很多国际文献.Zhang 等研究了生命预期的上升对家庭教育投资,储蓄及经济增长的影响^[8].Bloom 和 Lee 较为系统地从劳动参与率、健康水平、储蓄、劳动生产率、资产回报率、财政负担等方面来分析老龄化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研究老龄化的影响不能简单地看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为这样的做法假设了各年龄人口的劳动供给、消费和储蓄率是外生给定的,而忽略了经济主体可能做出的行为改变,容易高估老龄化带来的负向影响^[9,10];研究老龄化的影响,重点应该放在理解人们的行为如何在各种政策环境下发生改变.Börsch-Supan 等研究了欧洲养老制度改革,提出应对欧洲老龄化的三种政策:对外投资以提高资本收益率、推迟退休年龄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11].

推迟退休年龄是应对老龄化最直接有效的政策.老龄化最直接的经济影响体现在养老金的给

付困难,在一些人口严重老龄化,而养老金体系缺乏灵活性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等国,财政危机频频爆发.从研究的角度看,什么影响人们的退休决策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在David Wise的领导下,以“社会保险和退休国际研究”(social security and retirement around the world)为题,对OECD国家开展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从法定养老金领取的年龄、养老金领取公式、职工残疾保险制度等方面,说明了制度设计跟人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点存在密切的关系^[12].经济学界对退休决策的研究也有大量的论文,有一些文献用结构模型的方法,主要研究养老金制度设计对退休的影响,也有很多简约式的研究,利用各种政策变化研究退休对消费、健康等方面的影响.Hou等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我国城镇职工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60岁~64岁城镇男性有42.4%多余的工作能力,城镇女性有37.6%多余的工作能力^[13].Deng等通过结构模型的估计来研究延迟退休年龄和改变养老金水平的政策组合对劳动力供给,个人福利和养老金项目的财务状况的影响做了比较^⑥.总的来说,我国在退休决策的研究方面很少,跟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很不相称,未来需要加强.

健康老龄化是应对老龄化的一个长期政策着力点.健康老龄化是指老年时期得到健康的身体和生活自理能力,身体健康包含躯体和精神、认知健康三个维度,生活自理能力包含在身体有慢性病的情形下仍然可以自主生活而不需要依赖他人照料.世界上各个经历老龄化的国家都非常重视健康老龄化,积极研究老年健康的决定因素,不只是从生物学机理方面,而且从经济、社会支持和健康行为的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建立健康养老追踪调查(HRS)数据的国际系列,目前已经在美国、英国、欧盟、爱尔兰、巴西、

墨西哥、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南非等国开展了类似调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由北京大学主持,自从2011年以来已经开展了多期调查,成为研究退休决策和健康老龄化问题的权威数据库^[14].

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防止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重大冲击,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9年11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从5个方面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工作任务:一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二是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五是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断发现问题积极应对是政策关注的常态.

1.2 教育水平和收入分配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收入差距.自从1990年以来,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收入差距扩大的国家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超过70%^[3].而收入分配差异受到不同收入水平者的生育率和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15].因此,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等政策对于改善贫穷者收入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有着积极作用^[16].收入不平等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长,而生育率所带来的人口数量及结构变化对其结果有着重要影响^[17].进一步的,一个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很大部分可以被教育程度的差距所解释.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以及技能偏向型全球化的扩张,使得教育回报率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呈现上涨的趋势,从而促进了收入差距的扩大^{⑦⑧}.高等教育回报率虽然可以为正在上学的儿童提供深造的激励,但是对于已经离开学校

⑥ Deng Y, Fang H, Hanewald K, et al. Delay the pension age or adjust the pension benefit? Implications for labor supply and individual welfare in China[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8897, 2021.

⑦ Acemoglu D. Technology and inequality[J]. NBER Reporter, 2003, 12 - 12. Available from www.nber.org/reporter/winter03/technologyandinequality.html

⑧ United Nations, World Social Report 2020.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20/01/World-Social-Report-2020-FullReport.pdf>, 2020年9月17日查阅.

的成年人来说,教育程度较低使得他们无法享受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带来的果实,因而面临被抛弃的命运。在多个发达国家,最近几十年,未完成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不仅收入没有上涨,反而持续下降^[18]。通过研究死亡数据发现,没有完成高等教育的白人,由于深陷低收入陷阱,导致的自杀和过量吸毒致死率大幅度上升,导致美国总体的平均寿命连续三年下降^[19]。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收入差距也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20]。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收入扩大是与贫困快速下降同时发生的,并非体现在低收入群体收入绝对下降,而是体现在高收入群体收入上升的速度快于低收入群体。至少在城镇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伴随着教育回报率的大幅度上升^[21]。Liu, Park 和 Zhao 研究发现,我国教育回报率的上升主要来源于制度变化和技术进步引致了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的上升^⑨。

近几十年来,我国教育程度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升,自从2001年以来,国家在贫困农村地区实行了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杂费,并给寄宿生补助一定生活费的一项资助政策,对于提升农村教育水平、普及初中教育有很大促进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农村高中教育普及率仍然很低。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城镇户口16岁~17岁年龄人口已经辍学的比例仅为5.0%,而同样年龄农村户口辍学的比例为27.3%。根据2015年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岁~30岁的中国青年人只有28%读过高等教育,24%有高中教育程度,42%只有初中教育,6%甚至没有初中教育水平。在技术进步飞速发展的今天,可以预见未来对技能的需求将持续高涨,未能上高中的,甚至未能上大学的人,将来都可能如同美国白人那样面临绝望的境地,因此需要重视教育的提升问题。

1.3 城乡结构和人口迁移

在长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收入水平上涨,由于恩格尔定律的作用,农业日益萎缩,促使

劳动力从农业大规模地流向非农行业,实现城镇化和地区之间人口再分配。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产业转移、技术革新,欧洲城市迅速壮大,最终整个欧洲转变为城市化社会。1958年,农业就业人口占劳动力比重,德国为16.9%,法国23.7%,意大利34.9%,英国4.4%;到了2007年,该比重分别下降到了2.2%、3.4%、4.0%、1.4%^[22]。英国在工业革命早期曾经限制贫民流动,但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政府修改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制度消除了人口流动障碍。德国政府在其工业化过程中,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和相关政府制度,逐步扫清了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

国际学术界对于人口跨区域流动的理解,是基于流动可以均等化地区收入差距的理论^[23]。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中国。我国自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后开始严格控制人口流动。长期城乡隔离的结果使得农村滞留了大量劳动力,造成了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当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改革把劳动力的支配权还给农民之后,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向非农产业,并最终进入城市。Zhao发现在九十年代劳动力流动的初期,城市的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使得农村人口进城存在很大心理成本,因此收入差距无法合拢^[24]。随着用工形势的转变,各级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堵”到“引”的过程,每年春节过后,很多东部沿海城市政府争先恐后吸引农村劳动力,跟九十年代用“三证一卡”限制民工进城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目前,妨碍人口流动的已经不再是就业层面的政策了,而是既有的户口政策,以及依附于户口上面的各项社会服务的地域分割性所带来的迁移成本,这些成本主要起到了妨碍家庭成员一同迁移的作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很多城市出台了针对高技能人才的优惠政策,保障其家属随迁、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但是仍然有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流动的障碍依旧很高。

综上所述,人口结构变化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加速进入老

⑨ Liu Xuejun, Albert P, Zhao Yaohui. Explaining rising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in the 1990s[J]. IZA Discussion Paper, 2010: 4872.

龄化的国家。人口结构变化不仅带来消费模式、经济增长模式和中长期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也为全社会公共治理、商业模式等微观组织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研究带来诸多新挑战。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也会通过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对总和生育率最终对人口结构产生较大影响。为此,探讨人口结构的影响因素和变化机理,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变化规律,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

2 主要研究方向

2.1 人口结构的影响因素和演化机理

人类在大部分历史中有着较高的生育率和死亡率,但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人口转型,表现在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上升,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转换,带来老龄化的问题。在某些国家,人口转换的过程伴随了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是男童比例过大。在人类物质财富累积的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也大幅度上升,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但是人力资本投资在人群中差异性扩大,引发收入差异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同时,随着经济增长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人类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就业和生活地点,使得人口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分布持续变化。自加里·贝克尔将家庭问题引入经济学分析范畴以来,生育率、性别选择、人力资本投资、人口迁移等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前沿研究领域。个体的收入、时间成本和家庭环境等微观因素,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和公共政策等宏观因素,都会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不同人群的行为具有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会导致人口结构的不同分布。研究人口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变化机理,既是对经济学一般规律的探索,又对我国生育、教育和培训、劳动力流动和老龄化等方面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多重生育政策下生育率及性别比的决定因素、养老体制对不同人群生育率的异质性影响、子女数量-质量权衡下的人力资本结构变迁、经济增长过程中城镇化的机制分析、区域经济不平衡下人口迁移的机制、儒家文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等等。

2.2 人口结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结构,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教育和技能水平、空间分布(城乡和区域)已经或者即将发生深刻的演变。老龄化、男女性别失衡、低生育率、人口的城镇化和跨区域流动等诸多现象都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但不仅限于)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教育和技能培训市场、婚姻市场、医疗和护理行业、保险市场、创新创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理解这些影响的方向、大小以及发生机理对于及时调整经济社会政策、引导企业及其它微观经济社会单位进行科学决策有重大意义。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人口结构演变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及竞争力影响机制;人口结构演变对消费储蓄行为、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人口结构演变对创新和创业的影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退休行为、照料模式的影响因素。

2.3 人口结构变化下的公共治理

人口结构变化对公共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需求。面对生育率下降、性别比失衡、以及人口老龄化所必然要求的推迟退休和提供老年照料的问题,为家庭提供儿童和老年照料公共服务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保障也越来越替代家庭的保障功能。在人口结构变化较大特别是快速步入老龄化背景下,亟需对公共治理的若干关键问题、政策设计和效果评估等开展研究。我国城镇化未来将加速,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重新配置劳动力、土地、房屋等资源,决定了城镇化的质量。一个国家内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必然发生的,如何缓解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治理问题。为此,需要评估公共政策对于改善人口结构的效果,设计平稳推进城镇化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方式,探索适应人口跨区域流动常态化的治理模式。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人口结构变化下公共服务的新模式;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公共治理政策机制设计与有效性分析;健康老龄化视角下公共政策优化设计及改善老年健康的效果评估;改善出生性别比的政策评估;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的路径选择;提高老年人自理能力的城市

设计;城镇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研究;鼓励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公共治理;人工智能与老龄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

2.4 人口结构变迁下微观组织管理理论创新研究

藉由年龄、性别、教育、户籍等人口因素所构成的人口结构通过劳动力供给和匹配与企业管理活动形成了相依关系,并受到了共享技术、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发展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同地域空间和时期内的人口结构呈现重要而缓慢的变化,包括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衡、教育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流动加快等。这些人口特征变化将影响工作的组织方式,对企业的商业模式、组织形态、人力资源策略等管理活动提出了新要求,促使企业采取灵活的用工方式和具有弹性的商业模式,并需要与之适应的组织管理理论从结构、流动和匹配等角度系统揭示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包括弹性商业模式、敏捷组织形态、柔性人力资源管理。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人口结构变迁下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基于“人与组织”匹配

的敏捷组织架构与变革机制研究;基于人口结构变迁的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人才无边界流动下组织资源配置理论与方法研究;人力资本流动与企业多层面创新研究。

3 结束语

人口结构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影响因素,其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巨大转型,我国面临着来自生育率、性别结构、教育水平、城乡结构等多领域的挑战。有关人口结构之研究需要继续关注其影响因素和演化机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人口结构变迁下的公共治理政策和微观组织管理理论等问题,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治理合力,探索缓解相关社会经济问题的破局之道。今后需深入探究核心科学问题,提高研究团队综合素养和学科交叉研究能力,以推动人口结构演变与公共治理、社会组织管理等领域有机结合,促进人口结构研究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Highlights[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9.
- [2] Chen Y, Fang H.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China's "Later, Longer, Fewer" campaign in old ag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1, 151: 102664.
- [3] Becker G 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in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 [4] Zhang J.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in China[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90, 3(2): 105 - 123.
- [5] Zhang H, Zhang H, Zhang J. Demographic age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vince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5, 43(1): 170 - 185.
- [6] Ebenstein A. The "missing girls" of China an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he One Child Policy[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10, 45(1): 87 - 115.
- [7] Zhang J 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its effects on family outcom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 31(1): 141 - 160.
- [8] Zhang J, Zhang J S, Ronald L. Rising longevity, education, savings, and growt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70(1): 83 - 101.
- [9] David E, David C, Günther F.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eing for economic growth[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10, 26(4): 583 - 612.
- [10] Ronald L.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view of a national academy repor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5): 234 - 39.
- [11] Axel B S, Klaus H, Alexander L. Aging in Europe: Reforms,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behavioral reactions[J].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5): 224 – 229.
- [12] Wise David A.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and Retirement Around the World: The Capacity to Work at Older Age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 [13] Hou B, Wang G, Wang Y, et al. The health capacity to work at older ages in urba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66: 1 – 2.
- [14] Zhao Y, Hu Y, Smith J P, et al. Cohort profile: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4, 43: 61 – 68.
- [15] David L. The dynamics of population growth, differential fertility, and inequal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5): 1103 – 1116.
- [16] Chu C Y C, Koo H W.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group mobility and differential fertil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80(5): 1125 – 1138.
- [17] David D, Matthias D. Inequality and growth: Why differential fertility matte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4): 1091 – 1113.
- [18] Autor D H. Work of the past, work of the future[J].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9, 109: 1 – 32.
- [19] Anne C, Angus D.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 [20] Carl R, Zhao R, Li S. China's Retreat from Equa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1.
- [21] Zhang J, Zhao Y, Albert P, et al. Economic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urban China, 1988 to 2001[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 33(4): 730 – 752.
- [22] 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引导人口有序流动迁移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J]. 人口研究, 2010, 34(5): 88 – 92.
Floating Population Service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To guide migration orderly and promote healthy urbanization: Summary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0, 34(5): 88 – 92. (in Chinese)
- [23] Rosen S. The Theory of Equalizing Differences[M]. New York: Elsevier, 1986.
- [24] Zhao Y H.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9, 47(4): 767 – 782.

Demographic change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ZHAO Yao-hui¹, YANG Cui-hong^{2, 3}, LI Shan-tong⁴, ZUO Xue-jin⁵, ZHONG Fu-ning⁶,
FANG Xin⁷, WANG Feng^{8, 9}, ZHANG Jun-sen¹⁰, LI Shu-zhuo¹¹, LIU Shan-shi¹²,
LI Hai-zheng¹³, FANG Han-ming^{14, 15}, ZHANG Wei¹⁶, LI Lei^{16*}, ZHANG Qin^{16*}

1.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Academy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s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4.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egional Economy, Beijing 100010, China;
5.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5, China;
6.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2, China;
7.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

na;

8.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9.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Irvine CA 92697, America;
10.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11.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1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13. China Center Human Capital and Labor Market Research,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14.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A 19104, America;
15. Schoo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10, China;
16.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Demographic structur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national strategy formulation. Demographic changes profoundl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patterns,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medium and long term competitiveness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scientif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vea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of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to study their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of micro-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such as public governance and business models of the whol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aws of change.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research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actively coping with population aging, improving education equ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across regions. In future research, we should continue to focu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its impact on social economy, the study of public governance policies under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micro-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heories.

Key words: demographic structur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ging; public governance; national strategy